

良渚文化高柄盖罐的“尚中”思想

肖凤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摘要：福泉山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高柄盖罐造型精美，每一部分都富有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其设计反映了良渚文化先民的“尚中”思想，体现了良渚文化时期“黄金分割”的概念。

关键词：良渚文化；高柄盖罐；尚中思想；黄金分割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1-0041-04

良渚文化是以太湖地区为主要分布地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距今约 5300~4000 多年。良渚文化玉器以造型奇特、纹饰繁缛、制作精致、内涵丰富而神秘著称于世；良渚文化诸多陶器的造型和纹饰同样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陶器也是思想和文化的一种载体。上海青浦县福泉山遗址出土的高柄盖罐，便是具有思想和文化内涵的一件代表作品。

—

高柄盖罐出土于福泉山遗址良渚文化的墓葬中 (M101: 2)。根据 ^{14}C 和热释光测定，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存距今约 5200—4200 年。依照层位叠压关系和器物形态变化，将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存分为五期，M101 属于第五期，距今约 4300—4200 年^[1]。这也应是高柄盖罐的年代。

高柄盖罐为泥质黑衣灰陶，由罐身和罐盖两部分组成。罐身直口，矮直颈，广圆肩，扁鼓腹，圜底，圆筒形高圈足；盖钮为细高柄，高柄中段内弧成束腰形，高柄中心有一个上下贯通的圆孔，整个器盖略呈喇叭形。罐口直径 7.6、腹部最大径 15.7、圈足上部直径 8、下部直径 9.2、口颈高 1、腹部高 6、圈足高 4.2、罐身高 11.2 厘

米；罐盖口径 8.4、盖高 10.8 厘米；通高 21.8 厘米（口部重合）。罐身圈足上镂刻三组弧边三角形与椭圆叶形组合镂孔；罐盖的高柄下段部位饰三道凸弦纹。通体打磨，漆黑光亮，器表有规律地分区施以硃红彩，罐腹中部及圈足底边各施一周宽带形硃红彩；罐盖高柄顶部及高柄上段满涂硃红彩，罐盖下段及喇叭口处施两周宽带形硃红彩；出土时彩绘已大部分脱落（图一）。

罐盖套盖于罐口之上，罐盖与罐身浑然一体。高柄盖、扁鼓腹、高圈足，三段分明，协调和谐。盖口与圈足上下对应，直径大致相等，更增强罐身与罐盖的整体性；圈足略微外撇，在视觉效果上罐盖与圈足原为一体，而扁鼓腹倒显出是附加而成。圈足直径适度，略显偏高，既显得稳重，又不失飘逸之气。鼓腹外凸，充满扩张力，显得敦厚度，同时腹部略扁，厚重中带有律动。罐盖高度与罐身高度相近，有高耸伟岸之感；高柄束腰，使得顶部微敞，更具挺拔超越之势。圈足偏高，腹部极鼓，盖钮修长，每一个部位都极度夸张，在大起伏、大变化中构成了高度的和谐，具有跌宕奔放的韵律。器表的黑色显得沉稳与庄重，施以红彩则增添鲜活与灵动。器物的轮廓线条流畅，纹饰简洁而不繁缛，毫无雕琢之痕，以大胆的造型和色彩搭配显示器物的典雅与高贵。高柄盖罐面世，牵动人们鉴赏的视线，引起学人思古的遐想。

高柄盖罐的造型完美无缺，在设计上独具匠心。高柄盖、扁鼓腹、高圈足，三个部分均无修改的余地。如果在高度和弧度上作任何变动，都会使整体造型显得突兀，落于下乘，便不能最大



图一 高柄盖罐

限度地体现大气与灵气、典雅与庄重。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每个部位,在设计上增之一分则多,减之一分则少,在严谨与超越中充满了憧憬,体现出智慧。高柄盖罐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如果没有积极向上的社会思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便不可能设计制作出这样的艺术精品。高柄盖罐蕴涵着良渚文化先民的美学思想、仁礼意识和人文精神。

二

艺术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必然反映。精神世界越丰富,艺术形式越多样;社会越公正,艺术越高尚;思想越深邃,艺术越纯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同样有每个时代的艺术。理解了这个时代的艺术,也就理解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也只有理解了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时代的艺术。良渚文化高柄盖罐这一艺术作品,与良渚文化玉器一样,所反映的是良渚文化的时代精神,从其造型可以解读出良渚文化先民的“尚中”思想。

“中庸”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中庸思想主要包含“尚中”、“时中”、“中正”和“中和”四个方面。其内在的逻辑是:“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古已有之,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中正”和“中和”是孔子对“尚中”思想的发展。“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其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其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其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2]。可见“尚中”是三代及其以前的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逐步发展成为儒家文化特别是中庸思想的重要标识。

“中庸”,“尚中”、“时中”、“中正”、“中和”,其根本在于“中”。在先秦古籍中,“中”的涵义大致有三:一是指中间、中等;二是指适宜、恰好,即合乎一定标准;三是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3]。程颐诠释为“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4]。朱熹注《中庸》云:“无所偏倚,故谓之中”^[5]。马道宗认为“中,是做事之准,恰到好处”^[6]。概言之,“中”的意义就是既不偏,也不倚,既不过,也无不及,遵循天下的正道,达到内心乃至社会的和谐。所谓

“尚中”,就是崇尚天下之正道,追求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根据“尚中”思想以及后来的“中庸”思想,无论是个人处世还是社会行为,无论是团体意识还是国家意志,都应遵天下之正道,循天下之法则,不偏不倚,张弛有度,喜怒俱枉,宽严皆误。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既要厚德载物,又要自强不息,随着时事变迁,需要根据“尚中”思想不断调整,以符合天下正道与法则。良渚文化的高柄盖罐,正是“尚中”思想的艺术表现。

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陶罐的圈足一般较矮,高度与直径比例悬殊,矮圈足使陶罐显得平实稳重,而高柄盖罐的圈足为高圈足,颇有特立独行的意味;新石器时代陶器的腹部或是微鼓,或是呈大鼓腹,像高柄盖罐的扁鼓腹较为少见,恰有横空出世的感觉;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器盖一般都较低矮,盖钮短小,为实用而设计,唯这件器盖造型独特,高度超常,大有唯我独尊的气概。中国史前陶器中的彩陶主要为黑、红等单色彩,有少部分多色彩,如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的大河村类型等。

高柄盖罐所蕴涵的艺术精神,在于其整体造型所表达的思想性。高圈足所要表现的是不落俗套,卓而不群,喻意内心世界乃至社会基础具有强大的内力,能够托起所有的憧憬和希冀并使之成为现实。高圈足与矮圈足相比,略有“过”的感觉,似背离“中”的涵义,但以圈足底部的外撇增加直径,以宽度弥补高度的突出,仍然“无所偏倚”;不高不足以显精神,不宽不足以补敦厚,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尚中”思想。由于圈足的高,在器物的整体造型上需要根据“尚中”思想作一定的调整,于是腹部被设计成极具扩张力的扁鼓腹,在对圈足的高作少许校正的同时,更将高圈足的余韵发挥到极致,使罐身显得既挺拔,又雄浑。圈足是纵向的高,腹部是横向的宽,形成了有张有弛;鼓腹的高度相当于圈足的高度,鼓腹的直径两倍于圈足上部的直径,鼓腹外凸部分的宽度相当于圈足上部的半径,处处显得张弛有度,“恰到好处”;无论是圈足的高度,还是鼓腹的高度,抑或是鼓腹的半径,均小于圈足底部的直径,始终使陶罐显得沉稳庄重,以此体现“天下之正道”。

喇叭形罐盖的修长和高柄的束腰,在设计上最是奇思妙想。盖口为直口,且有一定宽度,既

使高柄显得基础厚实牢固,又成为罐身与高柄的过渡。在整体造型上,上部罐盖与下部罐身的高度大致相等,盖口处于中部,棱角分明,端庄肃穆,承上启下,确也反映“尚中”思想。高柄束腰部位的纤细与罐腹的厚重形成强烈的对比,同时又通过盖口的庄重和高柄顶端的外敞得到中和;高柄的高与圈足的高对应,高柄的束腰与圈足的弧度对应,将高圈足的雅致发挥到极致。外敞的高柄顶部、盖口、扁鼓腹、外撇的圈足底部,形成四个横向的层次,一一呼应;高柄顶部的外敞富有无限的憧憬和对新事物的神往,将罐身的端庄提升到更高层次。鼓腹不宽不足以显持重,盖钮不高不足以显精神。在整体造型上,将盖钮设计成高柄为点睛之笔;罐身的设计思想,通过束腰的高柄得到升华;如果盖钮不为高柄,罐身的造型将失去意义。圈足的高、鼓腹的宽、盖钮的高,似“无可”,又“无不可”,似有偏倚,终无偏倚,在坚守天下正道的前提下,纵横驰骋,上下求索,左右建树,处处精彩,这应是“尚中”的最高境界。

高柄盖罐仍然蕴涵着深奥的秘码,需要一一解读。罐身高度与罐腹直径之比约为0.713,罐腹直径与器物通高之比约为0.720,两者数值较为接近,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良渚文化时期应该存在一个体现自身文化特性和美学价值的“黄金分割”。良渚文化的“黄金分割”,便是良渚文化社会“尚中”思想在艺术审美上的“中”。

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尚色制度,从瑶山祭坛的几重土色可以看出,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形成尚色的观念。高柄盖罐器表涂以黑衣,漆黑光亮,其上分区施以硃红彩,这样的色彩搭配当非随意而为,表现在高柄盖罐这一艺术精品上定有其深意。黑色象征庄严、肃穆、凝重,红色表示生命、光明、希望。红与黑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在以色彩表现“无所偏倚”的境界,在强烈的色彩冲突中最大限度地表达“尚中”思想,从而说明社会的“大道”。

良渚文化玉琮的中间都有一个上下贯通的穿孔,这中间的穿孔被考古学界理解为“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7]。高柄盖的中间也有一个上下贯通的穿孔,同样也应是沟通天地的通道。从“尚中”思想的角度讲,这中间的穿孔便是“天下之正道”,“无所偏倚”,亘古不变。

对高柄盖罐还可以作社会管理和统治层面的

理解。罐身象征社会组织基础、经济实力、民风教化,罐盖表示贵族阶层、最高统治权力、管理和统治体系。用今天的术语讲,罐身代表经济基础,罐盖代表上层建筑。从形象思维的角度讲,罐身是社会,罐盖是王冠。在思想和精神层面讲,罐身属于形而下,罐盖属于形而上。高圈足的特立独行,扁鼓腹的横空出世,高柄盖的唯我独尊,硃红彩的一鸣惊人,是统治者在“尚中”思想的规制下所具有的政治抱负。高柄中间的穿孔直通罐腹,既表示天地的沟通,也表示上下的沟通,上下的沟通即为君臣君民的沟通。以沟通达到社会的和谐,是为“天下之正道”。

高柄盖罐是根据“尚中”思想和良渚文化的“黄金分割”设计制作的,良渚文化时期无疑已经形成“尚中”思想和“黄金分割”的概念。

三

随葬高柄盖罐的墓葬为浅坑墓,墓坑长2.4、宽1、深0.25米;木质葬具已腐朽,其上见有硃红色彩绘残迹;随葬品有玉器、石器和陶器共95件,其中有玉冠形器1、玉钺1、石钺4、鸟形陶鬻1、高柄盖罐2件(另一件编号为M101:3,已残)。已经发掘的与M101同期的墓葬,均随葬一批玉器与精美陶器,规格上无大的差别。根据福泉山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和现有研究成果,这里是一处前后相承的贵族墓地^[8]。玉冠形器标志身份的高贵,玉钺、石钺是兵权的象征,高柄盖罐等陶器以及彩绘葬具也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可以说明墓主人生前应是一位贵族成员。

埋葬时于墓主人头骨顶部放置3件器物,两件高柄盖罐,一件鸟形陶鬻(M101:1)。鸟形鬻器口似鸟首,宽流上翘,器盖依口部形状制作;扁桃核形器腹略微下垂,两侧各有一条纵向弧形凸棱;腹部下列三个小扁足;腹背有一个绞索状环形把手;整体造型似一只伫立的企鹅。盂身高18.5、包括器盖通高19.2厘米;口至流长8厘米;腹部左右最大径12.5、前后最大径10、包括把手在内前后为13.2厘米(图二)。

鸟形鬻整个腹部丰满,显得富态而不臃肿;由三个小扁足支撑,有敦实沉稳之感;昂首挺胸,显示出高贵与洒脱;两侧的弧形凸棱,消除了腹部浑圆所带来的平庸;器表为黑色,凸现庄重与深沉。鸟形鬻同样是一件艺术精品,其设计制作思想仍然是“尚中”。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意识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礼制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玉器均为礼器,礼制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大特征[9]。高柄盖罐和鸟形鬶既不是一般的实用陶器,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品,而与玉琮、玉璧、玉钺一样是礼器,是贵族阶层才能享有的陶礼器。随葬时将两件高柄盖罐和一件鸟形鬶置于墓主人的头骨顶部,其寓意应是“顶礼膜拜”。

中庸思想包含“尚中”、“时中”、“中正”、“中和”,其中“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礼”和礼制在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形成,可见良渚文化时期也应具有“中正”的思想。中庸思想是在三代及其以前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形成的,



图二 鸟形鬶

其基本内涵在良渚文化时期已初步形成或初见端倪;中庸的提出,是对已有的思想文化进行理论总结上的一次飞跃。“尚中”当然需要准则,那就是“礼”,就是“中正”;“尚中”当然有其目的,那就是

“中和”;“尚中”当然贯彻于思想、行为和意志的全部过程,时时事事掂量“可”与“不可”。没有过程、准则和目的的“尚中”是没有意义的。高柄盖罐和鸟形鬶的设计与制作,体现的主要是“尚中”思想,除此之外,多少还含有“时中”、“中正”、“中和”的内容。

鸟形鬶的腹径与高度之比,同样说明良渚文化存在体现自身文化特性和美学价值的“黄金分割”。黄金分割率为0.618;通常所理解的黄金分割率的范围,小者如3:5等于0.6,大者如2:3等于0.667。鸟形鬶腹部左右宽度与器高(加盖)之比为0.651,在黄金分割率的范围之内;腹部左右宽度与鬶身高度(不加盖)之比为0.676,接近于黄金分割率的范围;腹部前后宽度(包括把手)与器高(加盖)之比为0.688,也与黄金分割率的范围较为接近;腹部前后宽度(包括把手)与鬶身高(不加盖)之比为0.714(小数点

后五位数为0.71351),与高柄盖罐的罐身高度与罐腹直径的比值(0.713,小数点后五位数为0.71338)基本吻合。这些比值不能不使人相信良渚文化先民具有“黄金分割”的意识,尤其是0.71351与0.71338这两个比值相当吻合,说明良渚文化一定有自身的“黄金分割率”存在。良渚文化的“黄金分割率”当在0.7左右,具体数值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才能确定。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诸考古学文化中,应该存在大致相似或相同的“黄金分割率”。

通过对鸟形鬶的解读,进一步说明高柄盖罐所具有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良渚文化时期已形成“尚中”思想和中庸思想所蕴涵的其它基本元素,良渚文化先民已具有“黄金分割”的概念。

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也是“礼”和礼制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尚中”、“时中”、“中正”、“中和”等理念萌芽和逐步形成的过程。蕴涵“尚中”思想和相关理念的高柄盖罐及鸟形鬶,作为礼器,是文明起源和礼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

“礼”的实质在于构建一种社会道德准则,合法地统摄人的灵魂和集体意识,以维系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这正是高柄盖罐、鸟形鬶以及良渚文化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 [1][8]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 [2] 杨庆中:《论孔子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齐鲁学刊》2004年第1期。
- [3][5](宋)朱熹撰,徐德明校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 [4](宋)程颢、程颐撰:《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6] 马道宗:《旷世胜经中庸术》,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
- [7]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
- [9] 邵望平:《礼制——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东方考古研究通讯》2003年第1期。